

## 回鹘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黄兆宏, 刘玉璟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回鹘,是我国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民族,曾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五代时期两次入迁河西地区。入迁的回鹘人充分利用河西优良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中西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内外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巩固了祖国西部边陲。

[关键词]回鹘;河西地区;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6-0108-05

### Uigur Movement into Hexi Area and Its Influence

HUANG Zhao-hong, LIU Yu-jing

(College of Arts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Uigu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It moved into Hexi area twice in Tang dynasty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Ta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in which Wu Zetian ruled the whole empire)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After its movement into Hexi area Uigur made good use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xi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Objectively speaking, it promoted the ra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securing the Silk Road and fortifying the western frontier.

**Key words:** Uigur; Hexi area; influence

回鹘,原名“回纥”,本是铁勒的一支,是我国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民族。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突厥处罗可汗残酷压榨铁勒诸部,厚敛其物,又杀害各部首领数百人。回纥部联合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起来反抗,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回纥逐渐强大起来,有“众十万,胜兵半之”。唐太宗贞观初年,铁勒契苾部千余家来沙州内附,唐太宗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武则天时,漠北回纥迁入甘、凉地区。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

月,首领顿莫贺上表请求唐朝允许改“回纥”为“回鹘”<sup>①</sup>,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也”。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回鹘各部离散,其中一支南下向西迁入河西走廊,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结合,并建立回鹘政权,因其牙帐在甘州,史称甘州回鹘,亦称河西回鹘。

迁入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良好自然地理条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顽强的生命力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

\*[收稿日期] 2011-08-25

[基金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课题(SKQNGG10002)。

[作者简介] 黄兆宏(1965—),男,甘肃平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

① 关于“回纥”改名“回鹘”的时间,史籍记载多有不同:《新唐书·回鹘传上》记载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唐会要》卷98《回鹘》、《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条》等记载在唐德宗贞元五年;《旧唐书·回纥传》、《旧五代史·回鹘传》等记载在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到北宋时,司马光等纂修《资治通鉴》,通过考征最终同意《新唐书》的说法,定在贞元四年。因史籍记载不同,后来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则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陈垣先生在《元代西域入华化考》中认为是元和四年;对此,刘美崧先生在《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上发表《回纥更名回鹘考》一文中重新指出,回纥改名回鹘的时间是在元和四年。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张传玺、李培浩、张寄谦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史讲稿》及刘义棠先生著的《维吾尔研究》等则主张贞元五年。

甘肃的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新的血液,体现了甘肃各民族的向心力与中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河西回鹘的创建和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在接触、交往、冲突中的大融合,形成了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并在维护丝绸之路,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加速了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的开发。

### 一、回纥首次入迁河西走廊及其原因

隋唐期间,铁勒原四十一部,经过不断的迁徙流移以及和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再加上自身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到唐初,只剩下十五部,其中,契苾部和回纥部先后入迁河西地区。

考稽史籍,最早入迁河西地区的铁勒部族是契苾何力部落。《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一月,契苾部酋长契苾何力,“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sup>[1]</sup>。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因薛延陀强盛,有部分契苾部众又归附薛延陀,并“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sup>[1]</sup>。契苾何力回归后入朝任职,其子契苾明在凉州统辖本部落,并自称武威姑臧人。由此可知,太宗时期,凉州地区的契苾部贺兰州一直存在,其都督一职由酋长契苾何力一门世代相袭。

高宗初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闻太宗驾崩便掀起叛乱,回纥首领婆闰率五万骑协助唐军收复庭州,建立奇功,婆闰被加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到其子独解支时,“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sup>[2]</sup>。这是史籍所见回纥最早入迁河西者,时间在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

回纥作为铁勒的一支,大批入迁河西地区是在武则天时期。这一时期,东突厥欲再次重建后突厥政权,游牧于漠北的回鹘诸部遭到突厥的打击,漠北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迁徙来到甘、凉地区。《新唐书·回鹘传》载:“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sup>[3]</sup>。

铁勒部落大批入迁河西地区,有着深刻的原因:

第一,后突厥势力强盛,不断夺取铁勒诸部居地。铁勒各部不满后突厥政权的统治,被迫南下降唐。《旧唐书·北狄·铁勒传》载:“至则天时,突厥

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sup>[1]</sup>

第二,铁勒入迁河西地区,与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记:“先九姓(即铁勒)中遭大旱,经今三年矣,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七八。今所来者,皆亦稍能胜致一,始得度碛,碛路既长,又无好水草,羊马因此重以死尽矣。不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以活喉命,臣具委细问其碛北事,皆异口同辞。又耆老云:‘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于是“比者归化,首尾相仍,携幼扶老,已过数万,然而疮痍羸惫,皆无人色,饥饿道死,颇亦相继”<sup>[4]</sup>。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也曾记:“臣在府日,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碛北丧乱,先被饥荒,涂炭之余,无所依仰,国家开安北府,招纳归降,诚是圣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窃见突厥者,莫非伤残羸饿,并无人色,有羊马者,百无一二。然其所以携幼扶老,远来归降,实将以国家绥怀,必有赈赡,冀望恩覆,获以安存,故其来者日益众。”<sup>[4]</sup>在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下,以羊马为本的游牧经济遭到重创。

第三,铁勒入迁河西,与河西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地理交通有很大关系。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战国秦汉以来,一直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驻牧之地,后来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农业在该地区也发展起来。回鹘是游牧民族,西迁河西以后,河西的自然环境为回鹘经营畜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另外,唐初修治的贯通大漠南北的“参天可汗道”,曾是唐朝与漠北回鹘等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加强了唐与回鹘等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到唐代初期,原铁勒四十一部,经过不断的迁徙流移以及和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再加上自身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形成十五部。他们中的一部分先后在唐太宗、唐高宗、武后执政时期分期、分批地迁入河西地区,“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间”。唐政府设置瀚海、贺兰、卢山、蹕林、皋兰等府州以安置回鹘、契苾、思结、浑部,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当地游牧民族的比重,而且也成为河西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

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sup>[3]</sup>。

## 二、回鹘第二次入迁河西走廊

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回鹘各部离散,其中一支回鹘越过戈壁,进入额济纳旗,然后沿弱水进入河西走廊,散居在甘、凉、肃等地,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结合。以后其势力逐渐强大,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融合,建立了回鹘政权。甘州回鹘成为当时控制河西走廊的一股重要势力。

此次回鹘入迁河西地区,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回鹘汗国瓦解,回鹘部众四处迁移。“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勤柴革欲篡萨特勤可汗,萨特勤可汗觉,杀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鹘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革、安允合,又杀萨特勤可汗,以廋馭特勤为可汗”<sup>[1]</sup>。又“属本蕃乘乱,种落未安,君长之间,自相疑阻”<sup>[4]</sup>。正是汗国内宰相拥兵,互相残杀,导致回鹘汗国迅速瓦解;另外,宰相、将军与外族勾结,共相侵逼。“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其相掘罗勿荐公引山北沙陀攻围之,可汗自杀”<sup>[5]</sup>。“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廋馭,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sup>[1]</sup>回鹘“为黠戛斯所攻,兵折众叛,畜产大耗,国人荐饥,流离转徙”<sup>[4]</sup>。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走向灭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二,河西地区在此之前已有回鹘部众及其近族部落居住,这样,回鹘再次进入河西,就自然而然了。一世纪初叶匈奴政权崩溃之时,漠北的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已经在金城、武威、酒泉等地定居和生活。另据前述,回鹘人在河西的最初活动是从贞观初年开始的,《旧唐书》卷199《北狄传》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迁往甘凉一带的回纥及其亲族部落是在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由于后突厥复兴,回纥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则天皇后时,东突厥贵族在漠北复国,进攻回纥,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在其酋长率领下,被迫从漠北迁往甘凉地区居住,受唐政府凉州都督管辖。可见,在9世纪中期以前,河西地区就已有回鹘人在此生活了,因此,回鹘汗国灭亡后,大批回鹘人从漠北迁到这个地区也就顺理成章了。

回鹘汗国覆亡以后,其部众四处逃散,其中一支投奔吐蕃控制下的河西走廊,《旧五代史·四夷附录三·回鹘传》记载,“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sup>[2]</sup>“会昌初,其国为黠戛斯所侵,部族扰乱,乃移帐至天德、振武间。时为石雄、刘沔所袭,破之,复为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所攻,余众西奔,归之吐蕃,吐蕃处之甘州。”<sup>[6]</sup>吐蕃将回鹘人“散处之”,可见,吐蕃将他们分散安置在甘州等河西地区。

宋代时,回鹘在“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sup>[7]</sup>。对此,吴广成《西夏书事》也有记载,“回鹘自唐未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sup>[8]</sup>。另据陈溯洛先生研究,五代至宋初,河西地区的回鹘,除以甘州为中心以外,还分布在沙州、凉州、肃州等地<sup>[9]</sup>。这次入迁河西的回鹘部落,与武后时期相比,不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都较为深远。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辽国、西夏再次联合进攻甘州,围甘州城数日,因阻卜叛辽,辽夏慌忙撤围,甘州城未被攻破。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西夏军攻破甘州,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瓜沙回鹘降夏,至此,西夏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

## 三、回鹘入迁河西走廊的影响

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在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五代时期,占据河西一个多世纪,并建立了较为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同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有很大意义,而且对河西和中原地区生产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进步都有重大的影响。

(一)继承了回鹘传统的游牧经济,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添了新的内容

回鹘汗国瓦解后,回鹘各部进入河西地区,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结合,并在河西地区繁衍发展一百多年,并使整个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共同体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甘州回鹘政权于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被西夏灭亡,之后回鹘各部再次离散,其中一部分撤向今新疆东部,与当地的西州回鹘回合,成为今日维吾尔族的共同祖先;一部分向青藏高原方向迁

徙;一部分未迁走的回鹘人,后被西夏征服,正如《西夏书事》卷15记载:“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最后他们和西北境内的党项、吐蕃、汉等各族人民融合;更有一部分退到祁连山北麓的沙州以南,成为后来的“黄头回纥”,顽强地生存于河西走廊,这一部分回鹘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同邻近其他民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即今日的裕固族,至今仍为河西的建设事业做着贡献。因此,可以说,回鹘的西迁为民族的整合提供了契机,为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和文化基础。

(二)加强了河西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巩固了祖国西部边陲

甘州回鹘统辖河西地区后,继承回鹘与唐朝友好交往的传统,同五代及宋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与内地各族人民往来关系密切。一方面,回鹘可汗不仅经常遣使向统治中原的历代王朝奉贡,且接受各王朝封册,以示臣服。据史载,其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始于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当年五月,汗国派遣阿福引为首的使团入贡,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贡,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周易言再入贡。贡使往来前后三次,受到了后梁太祖朱全忠的隆重接待。后唐建立后,使命往返更是频繁。有时一年一遣使,有时一年数遣使。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等入朝贡名马、玉石。唐庄宗李存勖接见使者。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入贡,后唐明宗李嗣源接见使者,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石敬瑭令卫尉邢德昭又册之为“奉化可汗”<sup>[6]</sup>。后汉、后周继起后,甘州回鹘贡使仍往来不绝。另一方面,回鹘可汗对中央皇朝始终以“舅甥”相称,形式上表示归附。这些与中原王朝友好往来的行为,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完成了河西地区的局部统一,巩固了祖国西部边陲。

(三)确保丝绸之路畅通,促进经济发展

甘州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中段,在占据河西之后,先后与吐蕃、西夏的统治集团围绕丝绸之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为维护中西交通,促进丝绸之路的经济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保河西至中原王朝的贸易通道畅通,8世纪末,“回鹘击吐蕃、葛禄于北庭,胜之,且献俘”<sup>[3]</sup>。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势力达到顶峰时,回鹘彻底打败吐蕃、占领北庭,从而确保了

丝绸之路的畅通。甘州回鹘在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劲敌是西夏,据史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sup>[10]</sup>,但直到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苏守信死,其子罗莽领西凉府事,回纥遣兵攻破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其马牛羊甚众”<sup>[11]</sup>。自此,凉州属于回鹘,回鹘控制河西走廊十余年,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结束了分裂割据,熄灭了连年战火,河西地区有了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甘州回鹘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大力发展以游牧为主导的畜牧业经济。据不完全统计,甘州回鹘共向五代、北宋进马28次,数量达2567匹;进驼6次,数量达589峰。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甘州回鹘的畜牧业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同时,由于回鹘人处在中西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sup>[13]</sup>等地,并且“多为商贾于燕,尤能别珍宝”<sup>[7]</sup>,他们的足迹西到波斯、阿拉伯,东至契丹的上京、北宋的汴京,这些回鹘人把中原地区的丝绸、金银器皿、服饰等物品运往西域、波斯、阿拉伯,同时将西域、波斯等地的药品、马、骆驼、玉制品等运到内地。在长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回鹘商人不仅充当了中国和西方经济往来的中间人,而且还在中西方的先进生产技艺的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回鹘的发展和中西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驱动文化的整合,增进了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1. 改变了回鹘人的宗教信仰,丰富了回鹘民族文化。回鹘人初信奉萨满教。唐至德年间(公元756—758年),又改奉摩尼教。由于其教法在普通游牧民中有较大影响,故在移居甘州后,仍有不少人信奉,但是摩尼教在汗国内盛行时间并不太长。9世纪中叶,在西迁后,由于受河西地区汉族、党项、吐蕃人信仰佛教的影响,他们开始信奉佛教。例如,公元1007年,甘州回鹘夜落纥氏派遣佛僧翟大秦来北宋送马15匹,想在北宋的首都开封建造佛寺。另外,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形象地记录了甘州回鹘人在佛堂中披袈裟、诵佛经的情形:“(甘州)回鹘奉释氏最甚,其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刳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敬亲。”这样,佛教作为境内民族共同

信仰,在回鹘人与河西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2. 在整合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回鹘自己的语言文字。回鹘最初使用突厥文,也用过的粟特文,回鹘西迁后,分布在东西交通要道,为了方便和中亚的粟特人以及内地人的贸易交往,大量使用在粟特文基础上创制的回鹘文,同时也使用汉文,当然由于地域的差异,河西回鹘在整合民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大量借用藏语词汇。公元1028年,西夏李元昊占据河西走廊以后,仍于1037年规定设“蕃字院”,“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sup>[8]</sup>。西夏的规定说明回鹘文在当时所占的重要地位。

3. 促使回鹘的风俗习惯发生变化。回鹘的入迁与融合,促使回鹘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从饮食上来说,粮食在西迁后的回鹘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从今天裕固族的习俗上可得到证明。按照裕固族的古老规矩,女方在同意男方的求亲之后,女方向男方索要一百二十种彩礼,这其中有许多体现回鹘社会生活习惯的例子,比如:“羊毛、驼绒不能少,……白面、大米不能少,黄米、小米不能少,……,茶叶、盐巴不能少,……农人的瓜果不能少,农人的蔬菜不能少”<sup>[13]</sup>;从居住环境上看,河西回鹘主要使用今蒙古式的帐篷,另外还有少量楼房。《新五代史》记载:“可汗常楼居。”定居甘州的回鹘,肯定居住土房而不是帐篷。从服饰上看,回鹘人的衣物主要以皮毛为主要原料,由于靠近农业区,因此,也以棉纺织品为衣服原料,妇女的服饰也很有特点。“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这种服饰,只有在后来的撒里维吾尔和今天的裕固族中找到痕迹。这说明回鹘人在进入河西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并随之影响到后代。

总之,回鹘两次入迁河西走廊,改变了河西走廊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促进了文化的涵化和借取,并产生支系文化,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回鹘汗国瓦解后,回鹘各部离散。进入河西走廊的一支,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汇合,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统一了河西地区,为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河西地区的经济,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今天裕固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祖国文化宝藏,增进了国内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 [参 考 文 献]

- [1]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291—5349.
- [2]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916—1742.
- [3]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861—6114.
- [4]董浩.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34—7164.
- [5]王溥.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5:1749.
- [6]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41—1843.
- [7]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91.
- [8]吴广成. 西夏书事校证[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79—147.
- [9]陈溯洛. 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J]. 西北史地,1988,(1):9.
- [10]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15.
- [11]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031.
- [12]孟珙. 蒙鞑备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6.
- [13]范玉梅. 裕固族[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40.

(责任编辑:云 飞)